

历史的冲融

马上帝国的兴衰

李景屏 等著

任何一个闯入中原的马上帝国
都面临着两种选择：
或留在中原，
或退回塞外；

任何一个决定留在中原的马上帝国
也面临着两种选择：
或从马背上走下来，
完成从游牧向农耕的历史巨变；
或继续留在马背上，
马上夺天下，
马上治天下，
马上失天下。

- 走上社稷坛 ● 碧血溅征袍
- 功梦圆舞曲 ● 乱耳丝竹恨
- 法哲的逃遁 ● 奇异的回光



PDG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一反过去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僵化视角，而从少数民族的文明发展和民族选择角度审视历史，力求写出一种个人与国家、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春秋更替，时势互易的历史韵味，写出民族冲突与融合的悲剧中的喜剧、喜剧中的闹剧、闹剧中的悲剧。为了便于把握，我们仍选取帝王生平作为贯穿历史和民族之“纬”和“经”。

《新潮文史书系》发语

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人们的文化意识已随改革的进程，日益向深层拓展，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把思考的触须伸向未来，也伸向历史，以便悉心探讨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内在联系，确定自己的存在方位和奋斗目标。作为出版工作者，出于对时代和社会的神圣责任，我们设计了这一带有文化特征的选题，用编辑所特有的方式，投入大时代汹涌的新潮。

我们兴奋！我们快慰！

这，是一座便桥，桥的两端是文学和历史。桥下，温热的生命之水正汨汨流过。此桥，没有草图，“匠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想象和审美水平营构桥的形式。因此，它的价值不在本身，而在尝试的勇气。能否有更多的同道通过和加固这座桥呢？我们热望着。

卷首语·冲融的热望

文明的大门一次次被战争撞击着。某一天轰然洞开，第一个冲进去的人便被千秋说道。

当一代天骄们承父祖之遗烈，振上帝之长鞭，一脚踏入金銮大殿的时候，这些个腥羶未去的草原之子，应该意识到一个巨大变异的发生：他们再也无法退回生养过他们的草原、沙海和大山，在追逐文明之梦的途程上，他们只有义无反顾。

这是不是一种代价呢？

过去的人们，始终有一个错觉，以为大汉文化威力无穷，即使被周边蛮夷文化之风暂时烟蔽的时候，也不失“同化”之功：一切都会回到原来的起点，回到汉文化的大纛之下。当然，明晰的历史法则早已无情地嘲笑了这一类大民族主义的“想当然”，一遍遍地打掉了“汉家威仪”，更一遍遍更换着中华民众的服饰、民俗、语言和心态，这数也数不清的深刻变化，无不在证明着历史永恒的烙印是无法因“同化”而抹去的。然而，不能否认，汉文化的内质始终如影随形，在与周边蛮夷文化的对比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品位而长流不断，并吸取新的营养而丰富发展，这究竟是因为什么？许多论者已经深入分析并指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生命力，但他们更多强调的仍是单纯而又特殊的同化意义，以为是汉家所独钟，他们忽略了问题极其关键的另一面，一个有关人类共同性的一面。

在工业时代以前，农耕文明较之游牧文明无疑具有使人类稳定发展和繁衍的优越性，特别是在东亚这一河汉交错细密、土地松软整一的大陆块上，农业文明犹如丽苑之花，自然绚烂，并必然的其独异的光彩辉映四方，当此之际，金主完颜亮有感于柳永“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句而投鞭南下，也就非但不足为奇，而

且极其该当的了，因为，他是在扑向一种文明。而有金一代的自觉汉化更证明了其努力的真诚。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文明与野蛮之较宜其然也。

问题还不止于此，伴随着文明的渴望，人们付诸热切的行动，一次次扑向那绚烂。有的如飞蛾扑火，涅槃化光；有的则如重器掩烛，毁明求暗，这其间的差异正在于对自己所追求的事物的理解。也就是说有着自发与自觉等不同意识的区分。几乎所有的中华少数民族在入关前都因经济、文化和政治交流已不同程度地汉化，以至臣服过，所以，当他们终于鼓足勇气叩关而来的时候，在其杀气和占有欲的背后，无不带有对高层文明的景慕和尊重，（有时对于汉族政权来说，还常常伴以振衰起弊的历史奇效。）当然，由于理解深浅之异和文明开化的程度不同，表现不一，亲疏有别，无数辈逐水草而居。以狩猎与战争为游戏的某些少数民族的汉文化之发蒙，则较他民族为晚，直到入关之后很久才逐渐达成与汉族人真正的互谅互容。但这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分割的人类正是这样，在千秋岁月的冲突与融合之中，走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一个大写的民族：中华。

范 炯

识于一九九二年深秋

目 录

走上社稷坛	
——北魏孝文帝·····	(1)
碧血溅征袍	
——西夏元昊·····	(38)
功梦圆舞曲	
——辽萧太后·····	(68)
乱耳丝竹恨	
——金哀宗·····	(124)
凄惶的逃遁	
——元顺帝·····	(186)
奇异的回光	
——清太宗·····	(213)

李景屏

走上社稷坛

——北魏孝文帝

任何一个闯入中原的马上帝国都面临着两种选择：或留在中原，或退回塞外；任何一个决定留在中原的马上帝国也面临着两种选择：或从马背上走下来，完成从游牧向农耕的历史巨变；或继续留在马背上，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马上失天下。北魏孝文帝拓拔宏之所以成为时代的骄子，即在于他选择了前者，使他的国家、他的臣民从马背上走了下来……

巍巍阴山自西而东，绵亘数千里，屏藩着一马平川的黄土高原，翻过这座千仞高的山脉便是一望无垠的戈壁滩。就是这样一块贫瘠、荒凉、干旱寒冷的大沙碛抚育出一个又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娴于骑射长于格斗的塞外子弟。他们从大沙碛崛起，越过绵绵阴山，牧马中原，逐鹿中原，问鼎中原，急匆匆走完崛起、奋进、衰败的历程，这一个个马上帝国的缔造者，统治者最终还是不免被所征服，所蹂躏的黄土地给吞噬掉……

如今这位鲜卑骄子——北魏孝文帝拓拔宏也被跨下的坐骑驮上这个快节奏的舞台，那刚刚翻过的一页——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混战、割据以及一个个短命王朝的兴衰骤变深深刺激着一颗励精

图治的心。颠簸的马背的确令人销魂，但脚下的土地已经不是那块荒漠千里的戈壁滩；农业文明所散发出的沁人馨香，也的确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而脚下的这块土地却是“马上”可以得之，“马上”难以治之。一边是传统，是千百年所形成的传统，是千百万人所习惯的传统；一边是现实，是实实在在的不可掉以轻心的现实；传统中所凝聚着的是历史的惰性，现实中所迸发出的却是机遇与挑战；这位鲜卑皇帝将何去何从？

从拓拔魏崛起

公元471年，八月，平城（今大同）太华前殿。

正在进行的登极大典把一个五龄稚童推上了人君的宝座，此人便是北魏孝文帝拓拔宏（467—499年）。自从进入父传子、家天下的时代，幼主临朝就时有发生，但眼前这位幼主的父亲北魏献文帝拓拔弘却依然健在。也许在鲜卑语中“弘”与“宏”的发音有所区别，也许是拓拔家族对于“弘”、“宏”的含义——宏扬、光大特别钟爱，急需发扬，光大北魏王朝，以至父子二代人的御讳竟音同、义同。

献文帝拓拔弘时年十八，君临天下已有六年，是个汉化程度很深的鲜卑统治者，“好黄，老浮屠之学”，且生性“聪睿夙成，刚毅有断”。一位青春年少的皇帝何以萌生逊位之念？难道果系“雅薄富贵”所致？

其实酿成献文帝产生退位之念的，正是太后的勃勃权欲。北魏自建国之初，为“防母后予政，外家为乱”，道武帝拓拔珪即创“凡立嗣子辄先杀其母”之制（409年拓拔珪立拓拔嗣为太子，“乃赐嗣母刘贵人死”），迨至献文帝被立为皇储（461），先后有五位母亲成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这一残酷的作法所能遏制的只是皇帝的生母及其家族，至于皇帝的嫡母及其家族不仅未受到任何约

束，反而利用这一局面而急剧膨胀自身的势力。献文帝的嫡母冯太后就是利用幼主即位、太后临朝称制起用兄弟子侄，成为北魏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冯太后出自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家庭，自其曾祖以来即同鲜卑慕容部交往甚密，“遂同夷俗”，其祖父辈甚至代慕容氏自立，一度成为北燕小朝廷的统治者。献文帝同这位既有权欲又同“夷俗”的嫡母格格不入，为了遏制冯太后的权势，献文帝决定禅位叔父京兆王拓拔子推。在献文帝看来，一旦皇叔嗣位，他的嫡母就成为皇嫂，从而失去临朝听制的太后身份。孰料禅位皇叔的做法却受到满朝文武的一致反对，所有参议此事的公卿，或以“更授旁支，恐非先圣之意”相劝，或以“紊乱昭穆，后世必有逆祀之讥”进谏，或以“若舍太子”，“刎颈殿廷”相威胁。献文帝成为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禅位皇叔”的失败，便导致一个冲龄之童的人承大统。从此这位小皇帝即被置于冲突的漩涡，一边是其生父太上皇帝，一边是其嫡祖母冯太后。其实这种较量，早在两年前一——拓拔宏被立为太子，就已展开。献文帝极力要把太子培养成为熟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据孔颖达所注，“三坟谓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谓少昊、颡顼、高辛、唐、虞所作之书，“八索”即“八卦”，“九丘”即九州之志），精通经史子集，能被汉族士大夫所认同的统治者。而冯太后却按照鲜卑人的传统，着重勇猛顽强、吃苦耐劳、当机立断等方面的训练；并凭借杀其母而立其子的旧制，把皇太子置于自身的严厉管束之下。在汉族经典的训熏与鲜卑强悍习俗的管束之下，孝文帝度过非同寻常的童年。

五年过去了，太上皇帝已成为北魏王朝的真正主宰，拓拔弘“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慎择牧守，进廉退贪”；“事无大小，皆据律正名”，“由是事皆精审”。

在太上皇帝的主持下，孝文帝始耕籍田（472年）；北魏下

达“劝课农桑”（473年）、“禁杀牛马”（牛者，兵之所资；马者，兵之所资；475年）的命令；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473年）。上述种种措施都表明太上皇帝正试图使北魏王朝从马背上走下来。然而这一从游牧向农耕的巨变，却由于拓拔弘与冯太后矛盾的激化以及拓拔弘的死于非命而中断。

北魏皇陵——金陵，位于平城西北三百里处（内蒙托克托一带），一抔黄土所吞没的不单是一具洋溢着青春年华的血肉之躯，还有那激荡于胸臆的宏图大志，23岁的太上皇帝已长眠于地下，只有他那赫赫功业依旧回荡在孝文帝的脑海中：

群学、博士、助教、生员的设置（466年）；

“悉罢杂调”以苏民困（469年）；

翻越阴山，横穿大沙漠，“往返六千里”的大战，令频频入犯的柔然部望风而逃，北魏的北部边境亦拓至女水之滨（470年）。

献文帝在退位以后，“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口传诏敕”，不避“矫擅”，“合则制可，违则弹诘”。其南巡怀州，发现被罢黜的枋头镇将薛虎子既为人干练，又颇具操守，遂不顾太后左右从中作梗，毅然起用薛虎子。尽管薛虎子起复后不久即充分显示出卓越的才干——“数州盗贼皆息”，“境内清宴”，然而太上皇帝却因此结怨于冯太后，薛虎子毕竟是经太后懿命而罢职的。

拓拔弘又因受汉族纲常观念的影响，对于冯太后的罔顾风化、“内行失德”，不堪忍受，毅然决然将太后所宠用的揽权乱政的李奕弟兄处死。退位的献文帝是以太上皇帝的身份与热衷于权力的冯太后抗衡，其结果则酿成年轻的太上皇帝中毒身亡，五内如绞的拓拔弘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太后杀我！”无所不在的太后！无所不用其极的太后！

拓拔弘留给儿子的不仅是“强自取柱”（柱同祝，断也）这一

血淋淋的教训，还有那刚刚开始的事业——从游牧向农耕的转变、从尚武向崇文的起步，如今这千钧重担已历史地落到孝文帝的双肩。

拓拔弘的暴卒，使得北魏王朝再一次出现权力真空。拓拔弘由于对嫡母的淫威深恶痛绝，在即皇帝位的五年里根本不曾立后，这位父亲绝不想再给自己的儿子留下一个处处制肘的嫡母。孰料这样一种情况，恰恰为冯太后再度临朝听政，铺平了道路。

太上皇帝的死使得孝文帝处于冯太后更为严厉的管束之下，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听命于嫡祖母，稍有疏忽便不免受到呵斥、笞责。从国事到家事，“事无大小，皆仰成于太后”，惟太后之好恶而定。对小皇帝来说“承颜顺志”，逆来顺受，已然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拓拔宏所单独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循例追尊其生母李贵人为思皇后（476年）。这样一件必不可少的例行公事，却招致其外祖父——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被满门抄斩。李惠为官“皆有善政”，冯太后不能容忍李惠以思皇后父亲的身份存在于政坛，诬“惠将南叛”，“诛惠及妻并其子弟”，“魏人尤冤惜之”（478年）。对此，孝文帝自然不敢有任何怨望之情。

星转斗移，岁月流逝，孝文帝躬亲大政在即。对于象冯太后这样一位精力旺盛、“猜忍多权数”的人，很难接受归政于皇帝的现实。更何况即将亲政的皇帝又酷似其父——聪睿好学，勤于为政，以及难以掩饰的崇文重道的趋势。冯太后似乎又看到其父拓拔弘那不散的阴魂，废立之念便陡然而生，决定以次孙拓拔禧取代拓拔宏。尽管拓拔禧远不及拓拔宏聪达，至今仍目不识丁，但在冯太后眼中次孙的确比长孙更具有鲜卑人朴实无华的气质。而且一旦废立成功，太后临朝还将继续下去，退一步说即使到了归政那天，拓拔禧也不会象其父拓拔弘那样无视太后的权威，无视太后的私欲。

年仅十三岁的皇帝在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时候被囚禁在一

间与冰窖无异的斗室，这里没有炉火，没有坐具，没有食物，没有饮水，就连窗棱上也没有窗户纸。单薄的衣裳根本挡不住呼啸而入的寒风，辘辘饥肠则使得瑟瑟发抖的躯体很难再释发出一丝热气。与世隔绝，饥寒交迫，吉凶未测，生死难卜，好难熬的三个日日夜夜。此刻死神正一步步向拓拔宏逼来，但战胜厄运的信念却一直在激励着他，他一遍又一遍地默诵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遍又一遍默诵着：“故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同增）益其所不能……”正是这些精神上的给养，温暖着一具被寒冷浸透的躯体，慰藉着一颗被饥饿煎熬的心灵，激励着那颗久经磨难的心顽强地跳动着。不息的生命之火吞噬着饥饿、寒冷、残忍、猜忌……

废立一事正按照冯太后的部署悄然地进行着，接拓拔禧入宫的使者已然派出，此刻这位老太后所等待的便是孝文帝驾崩的噩耗。孰料那团不曾扑灭的生命之火竟然把光亮抛洒到宫外，宗室老臣拓拔丕以及在拓拔部颇有影响的丘穆陵氏家族得悉这一正在进行着的绝密事件，这些老臣闯进后宫，逆鳞上谏，力劝太后收回成命，中止废立。也许是孝文帝多年来事亲至孝的诚意打动了一颗冷漠的心，也许是孝文帝的大难不死使冯太后感受到冥冥之中难以违抗的天意，也许是……总之这位嫡祖母对其长孙顿释前嫌，颇有那么一点“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的味道，遂祖孙如初。

冯太后继续临朝听政，但在她的御座之旁又增添了一把龙椅。一位把拓拔魏推上鼎盛时代的新君终于从平城崛起。

从马背上走下

公元481年农历正月，孝文帝南巡中山（今河北蠡县以南滹沱河北）。在从平城到中山的千里沃野中，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被圈禁的土地，一处处被辟为猎场的牧地，间或还有尚未清除的战争遗迹——断壁残垣、累累白骨、荒芜的土地以及不复有袅袅炊烟、鸡鸣犬吠的村落。从晋中到冀中，除了泥土的气息，很难再寻觅到谷物所散发的沁人心脾的馨香，谁能相信这片千里赤地竟是农业文明的发祥之地！

滹沱河，猪龙河滋润着这块古老的土地，当年这里曾是拓拔部的族人慕容部割据之地（386年慕容垂所建立的后燕定都中山），而北魏的创始人拓拔珪逐鹿中原的序幕亦因中山的夺取而被揭开。

淝水之败（383年）导致前秦（氐人苻坚所建）解体，黄河流域再度陷入四分五裂，后秦（羌人姚苌所建），后燕（鲜卑人慕容垂所建），西秦（鲜卑人乞伏国仁所建），西燕（鲜卑人慕容冲所建），后凉（氐人吕光所建），北魏（鲜卑人拓拔珪所建），南凉（鲜卑人秃发乌孤所建），南燕（鲜卑人慕容德所建），夏（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等割据一方的政权相继建立。在这纷争动荡的局势中，最活跃的莫过于鲜卑人，鲜卑的四大部——慕容、拓拔、乞伏、秃发都无一例外地跻身于角逐者的行列。

在上述割据诸雄中，最有影响的是慕容垂所建立的后燕。慕容部由于长期驻牧辽河流域，最先同中原地区建立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对农业生产也较鲜卑其他部更为重视，这一点在慕容皝所建立的前燕（337—370年）政权中就已经十分明显。作为慕容皝第五子的慕容垂，继承了乃父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的传统，立国之初即“清刑狱，省赋役，劝课农桑”，“四方流民前后至者数万

口”，仓廩充实，天与人归，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以至北魏开国皇帝在平定内乱时，两次请兵于后燕（386年平定拓拔窟咄，387年平定刘显）。

公元396年八月，拓拔珪兵发中山。魏燕之战是北魏建国以来所经历的最激烈、最艰巨历时最长的一次战争。慕容垂所建立的后燕的确较之库英奚（东胡一支，388年北魏在弱落水南大败该部），吐实邻（389年在女水击破该部），柔然（391年在大碛南床山下大破该部）、匈奴（391年直捣该部首领刘卫辰、勃勃父子所居悦跋城）那些割据一方的游牧部族更难对付。拓拔珪在与慕容垂的军事冲突中并不占明显的优势，交战三次，二负一胜，虽则在参合坡大败后燕太子慕容宝，取得歼敌4万余的辉煌战绩（395年十一月），但北魏所付出的代价却是3万余家百姓被掳，百余万斛糜子被掠（395年七月）以及平城的一度陷落（396年三月），如果不是慕容垂在占领平城十天后突然病危，并死于撤军途中（该年四月），鹿死谁手，尚难预卜。

拓拔珪利用慕容垂新丧，慕容宝闇弱的有利时机，率步骑40万大举伐燕，“旌旗二千余里，鼓行而进”，该年十月兵临中山城下。然而由于“军食不给”，顿兵城下的拓拔珪不得不“罢中山之围，就谷河间，督诸部义租”。

凋敝的经济不仅影响着拓拔魏逐鹿中原的步伐，也影响着北魏这部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由于财政匮乏，拓拔朝廷无力向官吏支付俸禄，只能听任官吏自行搜刮，这样一种缘于经济的权宜之计时时诱发着恶性膨胀的贪欲，贪风就像无孔不入的霉菌腐蚀着北魏王朝的上上下下。堂堂尚书李顺在出使凉州时，因贪于“金宝”，向朝廷隐瞒北凉王沮渠牧犍的不轨言行；当太武帝拓拔焘“议伐凉州”时，李顺竟以“自温围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绝无水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等危言耸听的谎言力阻出师；而当其奉命“差次群臣，赐以爵位”又因“受贿，品第不平”，假公

济私（443年）。误国如此，终因一个贪字！虽说是贪者自贪，廉者自廉，但北魏政府却无力养廉。深得太武帝信赖的高允（出任太子傅），为官几十年“常使诸子樵采以自给”，“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不立”其家“惟草屋数间”，“厨中盐菜而已”，清官如此，终因“无禄”！

向官员发放俸禄是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的前提，然则孝文帝却难为无米之炊。

经济的凋敝缘于对农业的忽视，对农业的忽视又缘于历史的局限。公元一世纪末，拓拔部西迁大沙碛，进据匈奴故地（公元一世纪初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北匈奴，南匈奴越过阴山入据河套，北匈奴在东汉政府的追击下西迁）。这就使得拓拔部同中原地区的联系至少较慕容部晚了两个世纪。三世纪中叶，从戈壁滩崛起的拓拔部冲出大沙漠，雄踞阴山。阴山以北虽然荒凉，但拓拔人一旦在角逐中失利，即可北入阴山。当年拓拔珪的祖父拓拔什翼犍所统治时代（315—376年）被前秦消灭后，该部即跃马北上，以阴山为屏障，抵挡前秦咄咄逼人的攻势。而当时燕开国皇帝慕容垂“踰青岭，经天门，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云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北魏首都平城后，阴山再一次成为北魏统治者的避难所。对阴山的依恋使得拓拔部更为热衷于骑射，而这种对骑射的热衷又使得他们在中原逐鹿中愈发变得骁勇善战。伴随着军事征服所带来的军事掠夺，竟也使得一向匮乏的财政一次又一次得到缓解。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统兵西征，一举歼灭割据凉州的匈奴人政权（401年，沮渠蒙逊所建），中原再度实现一统，结束了自淝水之战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割据与混战。然而一统带给北魏王朝的并不是经济的复苏，却使得那种依靠战争掠夺现成社会财富的作法很难再有用武之地，因而经济上的匮乏较之过去反而更加突出。以至一向热衷征战的太武帝也同群臣探讨起

“为政何先”的问题。尽管拓拔焘所信赖的汉臣高允明白言道：“若国家广田积谷，公私有备，则饥谨不足忧”，但以农为本的思想并未被拓拔魏所接受。在马上统一中原的太武帝依旧在马上治理中原，或北讨（443年、448年、449年三伐柔然），或西征（444年征吐谷浑、445年击鄯善，448年破丐耆），或南伐（445年“掠淮、泗以北”，450年掠陷悬孤、掠六郡生口，451年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抢掠一空），这种“唯以抄掠为资”的远征已成为维系经济的一种手段，对柔然的追剿一次就获“民畜凡百余万”（449年），因而对拓拔部的上上下下来说，颠簸的马背的确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

往事历历，展现在孝文帝面前的，是一串串尚武的足迹。这一串串尚武的足迹，既使得拓拔魏力挫群雄，捷足先登，也使得拓拔子弟被卷入两种文明冲融的漩涡，承受着游牧与农耕、传统与现实在相互撞击中所产生的巨痛。传统中所凝聚着的是历史的情性，现实中所迸发出的却是历史的机遇；从令人销魂的马背上走下来固然是痛苦的，然而继续留在马背上，继续穷兵黩武、继续无视经济这条杠杆，那么他的帝国就会像匈奴所建立的前赵（318—329年）、羯人所建立的后赵（319—349年）一样来去匆匆。如果孝文帝无视历史所赐予的机遇，听任人居中原的游牧部族——匈奴、羯、氐、羌等继续跃马横抢、继续保持尚武的旧习、继续对中原地区肆无忌惮地进行劫掠，那么拓拔人所建立的王朝就像是一座建立在沙丘上的大厦，一遇变乱就不免分崩离析。前秦（351—394年）缔造者苻坚所经历的厄运就是前车之鉴。

事实上，在北魏统一中原以后的四十多年中，一个个骁勇善战、狂躁不安的游牧部族始终放射着各自的离心力，时时刻刻都企图支解这个统一不久的帝国：

439年，氐人杨难当率众数万犯上邦；

- 440 年，北凉宗室沮渠无讳叛据酒泉、张掖；
- 443 年，氐人杨文德起兵据白崖；
- 445 年，卢水胡人盖吴聚众叛于杏城，诸胡纷纷响应，拥众十数万；
- 446 年，氐羌万余人及休官、屠各二万余人起兵上邽；
- 447 年，吐京胡、山胡聚众叛；
- 456 年，丁零数千家据井陘叛；
- 460 年，河西胡叛；
- 462 年，石楼胡叛，氐人仇傖檀反；
- 471 年，西部敕勒叛，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
- 473 年，氐人叛据武都；
- 474 年，柔玄镇敕勒叛；
-

从马背上走下来，这不仅是恢复经济的前提，也是稳定政局的前奏，只有把入居中原的游牧部族一个个纳入农业文明的轨道，孝文帝脚下的沙丘才会化作基石。

望着脚下这块荒弃多年的土地，孝文帝不禁感慨万千。曾几何时，这里暴殄的富庶，就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塞外的铁骑，纵然是岿然壮观的万里长城、绵亘起伏的千里阴山也挡不住游牧部族南下的洪流。匈奴人、羯人、氐人、羌人以及鲜卑人纷沓而至，既腐朽没落又被内乱耗尽元气的司马氏集团，哪里经受得住这一股股洪流的冲击，仓皇逃至江南，凭仗长江天堑，另建东晋（317 年），苟安于半壁江山。从此中原大地便沦为各游牧部族竞先逐鹿的战场，数百年的古都洛阳、长安沦为一处废墟，人烟稠密的中原大地竟至赤地千里，黄河儿女的大量南逃则使得惨遭屠掠的中原不复再有鸡鸣犬吠……

虽然这是一块被废弃的土地，但它依旧是一块沃土，只要有辛勤的汗水不断的浇灌，依旧会结出累累硕果。突然，孝文帝的